

吉林文史资料第六辑

铁 窗 内 外

狱中生活见闻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吉林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

吉林省报刊登记证第171号

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1985年4月长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0.95元

编 者 的 话

旧社会的监狱是旧社会的缩影，是阶级矛盾表现得最集中最明显的地方。本辑首次刊出的周东郊遗稿，生动地记述了旧社会监狱的黑暗，并透过监狱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周是东北早期的中共党员、东满区委书记，以《泰东日报》《民声报》等报纸记者身份，在东北各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1月在延边龙井被捕，后解送吉林监狱。他以敏锐细腻的文笔记述了狱中各类人物的身世、人生哲学和心理状态，有杀人犯、强奸犯、惯匪、贪官、作恶多端的狱吏和“炕头”，有地主、商人、旧军官、白俄、马戏团员，也写了赵尚志、苏子元等革命者和无辜受害的平民百姓，“形色庞杂蔚为大观”。该遗稿对了解“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社会状况以及党的活动，有重要参考价值。另有王昕斋等狱中生活见闻三篇，均为亲身经历。本书可作为研究近代史的参考资料和文艺创作的素材，也是广大青年具体地了解旧社会的良好读物。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铁窗内外……………周东郊（1）

序言（1）——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1）——从《民声报》谈起（3）——一言九鼎（6）——从龙井村到延吉（9）——几天的兵棚子生活（14）——从延吉到吉林省城（17）——镣铐入狱（21）——人间地狱弱肉强食（27）——生活就是这样（32）——军事法庭（37）——铁窗之会（41）——春节（48）——同志之间（52）——赵尚志其人其事（57）——案子转到高等法院（60）——半年来日常生活一般（62）——一场风波（65）——监狱（68）——罪人·无罪的人（74）——赵副官长和“齐司令”（80）——初入看守所我的同案伙伴（84）——再次见到妈妈（89）——检察处起诉了（92）——两条腿解放了（96）——生活（99）——赵中心与张大个子（104）——预审宣判（111）——妈妈又两次来到松花江畔（114）——读书·思想（117）——疯·残毒（122）——悲惨世界中的两个故事（130）——重回监狱·马戏团员（138）——一九三〇年春节（143）——独身监生活（146）——小天地中的大剧场（151）——刑·酷吏（156）——炸狱（158）——孝悌之道·马家弟兄（161）——火烧影院（168）——熬出了有形牢笼（172）——忆中诗草（181）

伪县长坐牢记……………王昕斋（183）

虎口余生记……………宫宪斌（195）

旧监狱无异死亡营……………郎荷之（203）

铁窗内外

周东郊

序 言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我在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被捕，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出狱，被剥夺自由一年半多一些。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狱中生活，在此期间，我对人间事物，尤其是对底层事物得以广泛接触与认识，同时在社会科学学习上，英语复习和进修上也获得不少益处，可惜的是我冥顽不灵，在人生观的改造上鲜有所获，岁月蹉跎，徒增感慨。但自强不应止息，有生之年仍欲勉弩马之力，向正确道路攀登。乃继《狱中八年记》（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之后，记下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狱中生活与当时的感受，泥上爪指当可为余生戒鉴。记当时，言当时，力求不加杂今日之我，异当时思想作今日批判资料。

春日载阳，回首来路，痛策自己，不宜有所饶恕也。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我在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已住了十一个月了。

前两天，中共满洲省委派来一位视察员，他姓李，是位朝鲜同志。我们接头证实了彼此关系后，第二天我就通知东满区委其他两名委员：组织李别天，宣传孙绂生于十七日夜到我家开会。

连同李视察员我们四个人，在这天夜里一直谈到下半夜，会结束后我留李同志住在我家。太疲倦了，从外屋地板下取出的一些文件、地图等就搁在书桌上没有放还原处。

十八日晨，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玻璃窗上满是霜。我妻升着火炉，烧水做饭，我洗脸时外面有人敲门，我提着脸巾走到外屋，旋开房门的锁。

一拉开门，伸进来的是盒子枪管。

什么都明白了——抓我来了！

当时我的政治身份是中共党员，东满区委书记，职业身份是《民声报》编辑。

一九二四年我在奉天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由于读到社会科学书和结识了几位进步朋友，以及多难的国家、社会事态刺激，投身于一九二五年的学生运动，参加了响应五卅运动的沈阳六·十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中共在沈阳成立的暑期大学，受到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这年底由杨韦坚、佟汝励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翌年六或七月仍由上述两位同志介绍转入中共，在学生群众中进行工作。

一九二六年夏我被省立一师开除，考入东北大学，翌年春又被大学勒令休学，我的一生中的学生生活就自此终结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起我先后到营口、海龙两县立中学教书，这中间还有两个月在吉林省城中共吉林支部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被调回沈阳参加满洲省委办的党员训练班，结业后省委派我去延边进行建党工作。

一九〇七年，我生于沈阳的小康之家，幼年喜读书，书本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情况使我憎恶当时的人间关系、国际关系，产生朦胧的爱国和改造社会的意念，以后逐步接受了社会

主义思想，但我的觉悟程度和思想水平是谈不上的，我国的先秦政治哲学思想，个人名利观念还相当深地渗在我的意识里。尽管一九二六年成了共产党员，按党员标准说是十分不够的。

从《民声报》谈起

《民声报》是一九二七年秋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吉林省延吉道里的几个县的绅商筹备创办的一个日报。一九二八年初他们派人来沈阳聘请编报人员。中共满洲省委得到这个消息便指定有人事关系的同志与来人洽商，并决定派我应聘，以便借机在那里建党，经过联系我被聘为该报编辑，不久后我就赴任了。

延吉道的和龙、珲春两县接壤朝鲜，朝鲜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远在清朝末季，日帝吞并朝鲜后便向延吉侵略。在这以前，亦即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朝鲜居民不断越过中朝界江——图们江进入我国垦殖，清政府在延吉设立越垦局管理朝鲜民越垦纳税事宜。在当时的延吉府边境，沿图们江有一片滩地，朝鲜族垦民在江此岸另掘水沟，使江水岐出，这块滩地便介入江中成了沙洲，日本人把它叫做间岛；我国人称它为假江或延边。这里“延边”含义只是指那片沙洲。日帝妄图扩大间岛概念，但遭到我国指斥，阴谋未逞。一九〇九年日帝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图们江中朝界务条款》和《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虽然明确了上述滩地为我国领土，但取得了龙井村、局子街等地开为商埠以及修筑从吉林省会到朝鲜会宁的铁路、领事听审等特权，并在条款内载明准许朝鲜人居留垦殖。按“局子街”即后来的延吉

县街，是从越垦局得名的。

朝鲜人移入垦殖与年俱增，日帝陆续在延吉、珲春、龙井村设立领事馆，开办学校，发行日、朝语报纸，同时扩大对当地的贸易，掠夺原料，输入资本。一九一九年日帝修筑了朝鲜境内会宁到图们江上三峰的铁路，一九二四年又筑成从我国边境开山屯到延吉县境内的天宝山铁路，这两段接轨（全系窄轨）后，日帝对当地的经济侵略更得手应心了。在我国境内线路名为中日合办，组设了天图铁路公司，但实权握在日帝手中。日帝还在龙井村等地设立朝鲜银行，发行纸币，操纵金融；借口管理朝鲜民，设立警察机关，对当地朝鲜民行使司法、行政权，如此等等。

我去延吉的头一年，正是我国对列强实行二·五附加税，即于以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入口税值百抽五之外，另征二·五。龙井村海关实行之初，便遭到日商拒纳。日帝利用日本朝鲜浪人砸劫海关，强抢入口货物，引起了居民公愤，展开反日运动。这一年东北各地，尤其是大城市都发生过反日运动，为日帝所豢养的东北军阀也因与日帝矛盾日深，同时企图在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下缓和人心，将当地反日运动纳入它设想的范围——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提反对当时日帝的当权派田中义一内阁。它通过御用团体工商会等，赞助在“打倒田中内阁”的口号下的集会游行，妄图取得抗日运动的领导指挥权。

当时延吉道八县^①的官僚和民族资本家们因本身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侵害，有不少人参加了抗日运动，同时进步的朝

① 当时吉林省辖四个道：吉长道、滨江道、延吉道、依兰道。延吉道辖八个县：延吉县、宁安县、珲春县、东宁县、敦化县、额穆县、汪清县、和龙县。

鲜族人和身受日帝迫害的延吉各县，尤其是延吉、和龙、琿春几县的农民都投入了反日斗争。当时斗争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日帝侵略，反对修筑吉会铁路，取消日帝在延边的各种特权，争取关税自主……，运动取得的成就只是日帝从此按关税税则交纳二·五附加，在运动高潮时日货在延边的销售额降低而已。

一九二七年夏，延吉、和龙两县人士，主要是以和龙县教育局局长关俊彦，茂森林业公司经理方子涵等为首倡议在龙井村创办汉朝语合璧的日报。经过广泛捐募，筹得了基金。捐款人中有半数是朝鲜居民，他们当时受着双重压迫——日帝和地方军阀政府的剥削、压制。

这家日报经命名为《民声报》，自购了印刷器材，筹备半年后于一九二八年底出刊，日出一大张，一、二版和第三版的一半为汉文版，第三版的另一半和第四版为朝鲜文版，周日停刊。当年的报纸以广告费为营业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四版报中广告总是占去一版左右。

报社组织最高为理事会，理事多是地方绅商。报纸本身组织有社长、经理，下分编辑部、营业部和工厂。社长是由理事会从天津请来的安徽人安怀音，此人以前在沈阳的《盛京时报》、《东三省民报》作过编辑，是国民党员。一九二七年春去天津，《民声报》来沈阳聘请编辑人员时，经当时的奉天《商报》主持人盛桂珊介绍，安某应聘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去龙井村。《民声报》主持人为了把安长期留在龙井，就把报社社长一席给了安。当时延边是个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知识分子很少志愿到那去的。

一九二六年我因写文章、投稿关系同安怀音认识，后来因彼此信仰不同断了交往。他这时找不到助手，同时认为还

有办法驾驭我，同意我就职该报编辑。我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假道朝鲜汉城到龙井村，这时《民声报》已经出版十几天了。

编辑部里安怀音兼编辑长主持国内外要闻和社论编辑，我主持省内和地方新闻、文艺版，另有两位朝鲜人编辑，编辑一版半朝文版，还有一位译员名郑快儿，也就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朝中友协主持人河仰天。报社附有印刷厂，汉族、朝鲜族各一半，但全报社内汉人没有一个通晓朝文的。

《民声报》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的由国人主办的汉朝文合璧报纸。该报以反日为指导方针，发行数量虽不多（二千份左右），但影响面较广，尤其是在朝鲜居民方面。龙井村原有日人主办的朝文报纸《间岛日报》，自《民声报》出刊，打破了日人在这里舆论界中一言堂的局面。

因为我这次被捕是在《民声报》编辑任内，不得不把《民声报》的简单情况和我为何到那里去的经过略述一下。

一 言 九 鼎

这次被捕事前我已有预见，原因是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处于合作时期，中共沈阳支部决议命令大部分在沈阳的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协助在沈阳的国民党组建国民党奉天省党部，我当时还是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跨党党员。同年三月奉天省党部成立时我被选为省执委候补委员，夏间转为国民党执委兼宣传部长，因此国民党人大都认识或知道我。秋末，在沈的国共两党因处理国民党党务整理案矛盾激化，沈阳支部决定凡是共党身分已暴露的同志全部退出国民党，自此我也就与国民党断了关系。当时国共两党在沈

阳以及东北其它各地的组织均处于地下。一九二七年两党分裂——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彼此虽有斗争，但不似内地那样剧烈。一九二九年初东北军阀表面上归顺了南京政府，情况一变，凡为国民党所熟知的中共党员必然要遭到迫害。前节所述的安怀音于一九二八年夏已离开龙井村去天津，他也会把我和苏于元的所在地报告给他的组织。他虽然不确知我们是否还与中共有组织关系，但我们的平素言论和我编报的趋向，他却可以肯定我们的思想还倒在中共方面。

在这个估计下，我想过暂时离开龙井村，看一看情势，但当时工作摆不下，而且还有逞好汉的思想，就稳坐起来。果然不出所料，人家真来抓我了。

当天带兵来抓我的是驻龙井村的某营部的一名参谋。此人姓李，是我的小同乡。我在新闻界工作，交际面广，同他认识已经快一年了。

“老周！上边的命令，没法子。”李参谋向我道歉。

“这是为什么呢”我装做莫名其妙的样子问他。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镇守使署派来人，指名逮捕你，我不知道你住在哪，今天早晨才打听到。”他回答，意思似说明，如果他知道我这新移居的住处，或许事前会给我通风报信呢。

随他来的手提盒子枪的几名士兵站在里外屋听候他下命令。

“先搜查一下！”李参谋给士兵下命令，转身对我说：

“对不起，上边的命令。”

士兵们还客气，只搜了一下柳条包和一只手提小皮箱，把箱里的书函拿出来放在桌上，同昨夜放在桌上的文件等混到一起。

“把你衣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李参谋对我妻说。又转身对我：“等一会还要搜你呢！”

这句话真是重如九鼎，如果不是他这一句话提醒我，搜出我衣袋里的李视察员携来的党组织介绍信（用药水写的，已经过我显影了），我此后生活的历程将是另一个样子，或许我早已骨腐泥土了。

李参谋的确出于同乡情感和平素对我的严肃生活作风的钦佩，先给我打了这个招呼。

我立即对他说：“起床后我还没去厕所呢！”

李参谋命令一名士兵随我去后院的厕所，我在厕所里把那封介绍信，撕成几片丢在茅坑里。我出狱后，见到妻子她对我说，她当日看见茅坑内我丢下的纸片，旁人也看见了，但没有人向外讲。

我回到屋里，李参谋再没有命令士兵搜我的身。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么早来你家。”李参谋指着站在炕边的李视察员说。

“我们原来不认识，他大清早来找我要求更正报上登出的一条新闻。”他们把李视察员放走了。

“那么，我们就走吧！”李参谋率领士兵押着我走出房门。我的还不满两周岁的儿子从被里爬出来喊“爸爸！”这孩子很伶俐，平常总随我出去，也许看到当时的场面吃惊了。我对他摆了一下手。妻呆呆地立在火炕边，睁大眼睛望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默默地随他们走上大街，街上没有行人，他们把我引到《民声报》社。

在《民声报》社编辑部里他们搜检了一些书刊、稿件，把这些东西同由我家拿来的文件、书刊、信、笔记本等放到

一起，裹在一只包袱皮里，这样一混搅给我以有利的辩解机会，因为报社是舆论机关，什么党派团体都会往报社寄宣传等类材料。包袱里还有若干信件，一九二八年前我的男女友人给我的信，虽然没有谈情说爱的，但文字大都很美，谈风物、习俗、文学、历史和时事等，内容有的很引人入胜。有个叫毕尚纯的女中学生，我俩通信关系有五年，关于苏轼的诗词的讨论尤多，她的文言文写的美而通顺。后来我通过律师了解到，我的案子转到吉林高等法院后，检察官刘某特别喜欢读那些信件，别的物证有的他都未触及，因而能把我打成严重的“反革命”罪犯的证物都由他手边溜过去了。当日东北司法界对共产党人如何危及他们的政权尚无具体认识，这主要是党在东北活动而窄，尤其是还未组织武装斗争。当局重视的是“强盗”“匪帮”一类案件。

最后，士兵把我绑上牵到大院子里。

院里，工人霍哲文被绑着，由一名士兵牵着立在那里。

霍哲文是延吉人，报社的排字工人，他同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关系，怎么逮捕了他呢？

我同霍哲文被押往离报社不远同一条街上的营部里。裴营长让我们到一间办公室里坐下。

从龙井村到延吉

裴营长也是熟人，他让我坐下前，叫人先解开我和霍的绑绳，第一句问我的话是：

“你同杨宇霆有什么关系么？”

“我同信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个鼎鼎大名的人我早就知道。”我回答。

杨宇霆当时是东北三省保安司令部总参议，他原是东北

最高统治者张作霖的亲信，留日士官生出身，对奉系军阀的部队、兵工等方面的建设立过不少“功绩”，同时也是帮助张作霖残酷剥削东北人民，尤其是剥削广大东北农民的主要帮凶之一，当时人们把他叫做张老将（张作霖），的智囊，捧他的人把他称做小诸葛。一九二五年奉系军阀势盛时，他曾被派任为江苏省省长。杨宇霆在奉系军阀中是一个派系的头脑，与老一辈的以吴俊升、汤玉麟等为首的“老派”，以郭松令，张学良等为首的“新派”分庭抗礼，互相争权夺利。一九二八年夏，奉系在关内再一次垮台，退出山海关。老将张作霖被日帝炸死于沈阳近郊皇姑屯。当时张家在东北地方势力中的封建关系还很紧密，少帅张学良被拥出当上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杨宇霆的心目中，不过是个花花公子，他企图趁此时机攫取大权，不但扩张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力，还同当时进占平津的广西系新军阀通款。

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张作霖，本来期望东北因群龙失首发生内哄，从而取得出兵东北的借口。但所期并未实现，乃转而在东北各系派中制造矛盾，并阻挠张学良倒向南京。杨宇霆的扩张实力活动与张学良的巩固政权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日帝又在中间推波助澜。张学良最后下了决心，于归顺国民党全东北更易青天白日旗后不久，就把杨宇霆连同他的亲信常荫槐（黑龙江省省长）杀了。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东北，事件发生在我被捕前几天。

裴营长不了解我被捕的原因，误认为我或许是杨宇霆这个派系里的骨干，因而问我是否与杨有关系。

我从衣兜中掏出十元钱（是日币，所谓金票。当日在延边除机关部队等官署外，几乎都使用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日币），请营部派人给我家送去。我这一生结过三次婚，妻子都

是不愿管经济的女人，家庭收入开支一直由我掌握。这时我每月收入六十元，发薪不久，钱都在我衣兜里。

我嘱咐去我家的一个土士说：“家里没有积蓄，这十元钱交给我内人，告诉她我没有作什么犯法的事，不久会回来，给我拿来一条毯子。”

一小时后，那名土士给我拿来一条灰棉毯，这条毯子是一九二四年我入师范学校时我父亲给我买的。延边我家什物简单，夫妻只有两床被褥，几件单棉衣。

这天下午从延吉镇守使署专程来逮捕我的一名少校参谋押着我和霍哲文坐上一辆小汽车开往延吉。汽车从我家住的那条街驶过，不禁想到我的妻子。我们是田父母之命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沈阳结婚的，那年我十七岁，妻二十一岁。她略有文化，同我一样都是不懂生活，不识事故的孩子。我们相处得还和谐，我到延边后，因为工作需要有个家作掩护，而且也想在思想上对她有所帮助。那时的知识青年大都羡慕思想同文化与己相等的女人，伉俪相偕。若干文学作品多以恋爱、结婚一类社会问题为题材，像翻译的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等，曾给知识青年思想投下激波的巨石。鲁迅先生虽说过与没字碑结偶是历史条件造成，也只有安心还债，百年厮守。但他个人终于另偕所钟。^①这一年春末，妻子来到龙井村，我们和好地度过十几个月，儿子也健康地长起来，尽管妻不适应我所做的事，但从不打扰我。现在我被抓了，她手边无钱，又不能自立，怎么生活下去

① 鲁迅先生这段话，见《热风》中《随感录四十》：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呢？这时我感到，一个人投身于革命最好是一个人，无家一身轻，省却给别人带来苦痛，自己也会轻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总摆脱不了家庭人事感情，不少人因此而走人斜路，害人害己，但这道必须逾越的关口是不易逾越的啊！

路上，押解我们的那位参谋也以为我与杨宇霆案有关，我对他说：“我如果同杨总参议有瓜葛，就不会在这边远地方混饭吃了。”把他引笑了。

天很冷，一路风雪，天快晴时到了延吉，小汽车开进镇守使署。当年东北地方行政组织，省以下设道、道以下是县、一个省至少有五、六个道。在每个道的道尹公署所在地一般都设有镇守使署，管辖道内驻军（地方军），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奉系军阀割据政权，剿除“土匪”，镇压人民。这时延吉道尹姓张，东北人，镇守使吉兴（满洲皇族，是后来投降日帝在伪满任过内阁中的某部大臣的大汉奸，听说一九六二年被特赦出狱）。

当年东北地方政权的文武官吏，绝大多数为宦旨在发财，渔肉人民，作威作福。在军事上听张老将指挥，在行政上“等因奉此”，在外交上得敷衍就敷衍，认真办他们的“公”事的百仅三四。高一级文武，除少数外，娱情声色、谋求苟安，有的连国内外局势一般常识都不熟悉。延边的几个县知事，营长以上的军官我大都访问过，有的连他们辖境内的事物都讲不清楚，甚至茫无所知。

我们到达延吉的当夜就被提审了，

我同霍哲文一道被引入一间大庭里，对面台上的一张大条桌上点着三盏煤油灯，天棚下挂着两盏所谓保险灯。大条桌后坐着五个人。中间的那个人穿着便服，五十左右岁，从讲话口音上听出是个江南人。后来听士兵讲他是镇守使署的

吴参谋长。台下左右立着十几名武装卫兵。

这名参谋长首先问了我俩姓名、籍贯、职业，然后立起来宣读了一份电报，电报内容是案奉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电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奉到南京政府电令，立即捕押潜伏在延吉龙井村《民声报》报社内的共产党要犯周东郊、霍子元。捕得后解送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法办云云。他宣读后又坐下，问我们是否共产党人，在地方上作了什么违法活动。

我回答说：“我去年年初由延边《民声报》从沈阳聘来，任该报编辑，同政治团体和党派无任何关系，在报社工作期间都是按该报办报方针行事，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文学宣传，到各县作过新闻采访活动，自信没有违法行为。至于与我同时被捕的报社排字工人霍哲文，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叫过霍子元。我们同在一个单位作事，但彼此并无往来。”霍哲文也据他的实际身份为自己作了辩护。

法官并指着挂在两侧墙上的各种刑具恫吓了我们一番，

吴参谋长似乎不耐烦再问什么就宣布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你们的案子要到省城解决，你们暂时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往上几天。你们如有钱，可以叫当兵的给你们到街上买饭来吃，“就此退庭”。

士兵把我同霍哲文押进兵棚子（士兵宿舍）。这是一般砖瓦结构的长筒间房子，屋中间有一条空地，两边是长火炕。夜里士兵一名挨着一名睡在上边。当时已吹了就寝号，被褥都放下了。

一名小军官指给我同霍哲文睡的地方说：“你俩一定累了，没什么铺盖，就脱下上衣当被吧。我们再借给你俩一床被勉强维持一两天。看你俩都是识文断字的，怎么落到这个